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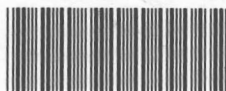
渤海湾的浪潮

林元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渤海灣的浪潮

林元著



SEU 0676692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渤海灣的浪潮

林元著

*

新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32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字數 40,000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3,000 定價(6) 0.18 元

前 記

我在一九五五年秋末和一九五六年春初，先后訪問过兩次河北省唐山專区撫寧縣的“渤海農漁業高級生產合作社”。前后訪問的时间共十二天。时间虽然短促，可是，我已看見了渤海社的社会主义的前進步伐：第一次到这个社訪問的时候，它还只是一个三千多个社員、一万二千多畝土地的初級社；三个月后，我再到这个社訪問，它已經成为一个拥有一万三千多个社員、四万五千多畝土地的高級社了。它的發展，正象渤海灣的浪潮一样——一浪跟着一浪地向前推進。

随着渤海社的前進，渤海社涌現了無數具有社会主义品質的新人。本書里所寫的梁林、“三蘭”、孙翠荣、孙鳳柱等，僅僅是其中的几个。

一九五六年六月于北京

目 次

前記	I
渤海灣的浪潮	1
“三蘭”	11
一个好社員	20
揚花吐穗的时候	26
渤海社的妇女	31
訪問一个生產隊	36
渤海社的一天	41
渤海社在飛躍前進	52

渤海灣的浪潮

河北省唐山專區境內有條洋河，象瓜藤似的向渤海灣蜿蜒伸去。洋河兩岸的鄉村，就象一个个結在瓜藤兩邊的熟透了的南瓜。這條瓜藤蔓延到撫寧縣境流入渤海灣的當兒，果實就結得更多，其中在河西的一個叫西河南村，另一個叫水沿庄。水沿庄在西河南村的西南，兩村僅隔二里多路，都歸西河南鄉管。水沿庄人少地多，每人平均有四畝多地，中農較多；西河南村人多地少，每人平均僅有土地八分，多數是貧農。就這樣，人們給西河南村的人起了個名兒叫“窮八分”。

西河南村因為地少人多，遇上風調雨順的年景，人們的生活還可以馬虎對付過去，一鬧上災荒，生活就過不下去了。就是土地比較多的水沿庄的農民，遇上荒年，生活也同樣對付不了。一九五三年這裡就鬧了個災荒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兩個村子的人們象全國的人民一樣，學習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，眼睛慢慢地亮了起來，他們認識到要戰勝災害，過富裕的日子，必須組織起來。又恰巧在這個時候，政府在這裡設辦的一個勞改農場結束了，準備把農場的稻田和一些水利建設工程無償地贈送給當地農民，並且號召農民組織起來。於是，一九五三年底，一九五四年初，西河南和朱建坨兩個鄉——水沿庄、西河南村、宗楊庄、后朱建坨、前朱建坨、唐義庄、丁義庄、

苏撑子等七个村子，便开始醞釀組織生產合作社。

可是，組織合作社并不是那么順利的，一开始就發生了問題：水沿庄的人不願意跟西河南村的人搞在一塊，他們說：“‘窮八分’要錢沒錢，要地沒地，要牲畜沒牲畜，跟他們搞个啥！”

西河南鄉的鄉長是梁林。他是水沿庄人。这个給地主、富農当过長工，又在旧社会里干过搬运工的庄稼人，因为自己是从苦海里跳出來的，尝过窮苦的滋味，便坚决要跟“窮八分”搞在一塊。他想：“翻身了，要走富裕的道路，倒把窮苦兄弟抛下來，那可不行哪！”

于是，他就挨家挨戶去動員，說明党領導大伙办合作社是为了大伙都过富裕的生活。又給群众分析：水沿庄地多人少，要是自个搞一个社，准忙不过来；西河南村却有的是劳动力。两个村一搭配，就要啥有啥了。

經過梁林这么一解釋，有些人的思想搞通了，可是，也有些人在嘀咕：“跟‘窮八分’搞在一塊，不是胳膊往外擰？”

有个坏分子立刻乘机鑽空子說：“可不是？‘窮八分’連条驢腿都沒有！”

話一傳到梁林的耳朵，这个在一九四九年就参加了党、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，立刻就聞出了這句話的味道。他仔細一調查，果然是那个坏分子想乘机兴風作浪，便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，对他進行斗争，揭穿了他的陰謀。經過这次斗争，群众受了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，覺悟提高了一步，大伙这才同意跟西河南村合搞一个社。因为村庄面臨渤海，便起名叫“渤海社”。又因为跟朱建坨鄉的社同屬一个社，朱建坨鄉的便叫渤

海一社，西河南鄉这个便叫渤海二社。

社虽然建成，可是水沿庄有些人的思想，仍旧有问题。他们对梁林說：

“說啥你也得当社主任，要不咱跟西河南村还是各搞各的。”

“党和群众叫誰当就誰当，”梁林說，“誰当都是一样，誰当都得听党的話。”

結果，恰巧梁林被选上了主任。水沿庄的人乐得拍起掌來，西河南村的人也乐得拍起掌來。

梁林从鄉長的工作崗位跨到社主任的工作崗位，很多事情都感到生疏和困难，象一个經營慣旱地的人突然經營起水田來一样。他首先碰到的困难，是“四評”工作开始的时候，水沿庄的牲畜戶不願把牲畜入社。眼看要送糞、下糞了，可牲畜还没有！牲畜戶問：

“牲畜入社了，秋后給不給錢？”

“根据社章，”梁林說，“三年至五年一定把錢归还！”

經過左动员右解釋，牲畜戶总算把牲畜牽到社里來了，水沿庄入了八匹高大的馬、騾，西河南村入的却只有几头小毛驢。水沿庄的牲畜戶心里已有八分不舒坦，一听到要把他們的牲畜調撥到西河南村，就頓時炸开了：

“誰要是把我們的騾子拉到西河南村，我們就立刻出社！”

可是，这些威脅的話並沒有把梁林吓倒，他又耐心地對他們解釋說：既然大伙同在一个社，就是一家人了，有牲畜的應該幫助沒有牲畜的。再說，牲畜既已入社，不听社的調配还

行？再說……說呀說的，說到對方感到實在沒有理由了，便只好默默地听从社里把牲口調配到西河南村去。

“四評”工作完畢，牲畜調配適當，渤海二社的十三个生產大隊就热火朝天地投進了生產。先進的生產隊象雨后春筍一樣地涌現出來。梁林和社干部們研究了一下，為了把生產推向更高的高潮，便決定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，展開流動紅旗競賽，展開批評與表揚。經過調查，發現西河南村的第五生產隊有很多模範事迹，就決定表揚五隊；水沿庄的第十一生產隊搞得最坏，就決定批評十一隊。估計到水沿庄有些人可能会有意見，便先在黨、團員中做了醞釀工作。果然，當宣布表揚五隊的時候，水沿庄就有些人不服氣地向梁林提出了質問：

“說五隊是模範，咋模範的？把它的模範事迹說說看？”

“咋模範的？”梁林眉毛一揚，就一口氣地說下去，“五隊起早貪黑，保證質量，社委會的每一項計劃，他們都很好完成。種地的時候，社里計劃十天種完的，他們九天就種完了。社里搭配牲畜，少搭配了一套給他們，可是他們照样完成了生產任務。他們知道社里的經濟困難，就處處動腦筋想辦法：沒有繩，自己打；沒有套，自己做；沒有鞭，用棍代替；缺少糞，就拉砂改良土壤；……五隊處處听黨的話，花小錢辦大事，這些模範事迹还不够么？”

梁林說了，為了使對方心服，便拉着他們到五隊的地頭去參觀。五隊的庄稼硬是長得出奇：一眼望去，一片綠油油的。——誰也沒有話說了。

經過批評表揚以後，大伙的勁頭全上來了。過去瞧不起“窮八分”的，也慢慢改變了看法。



生產雖然搞起來了，可是，更大的困難卻來到了梁林的面前。因為一九五三年鬧了災荒，現在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，西河南村的一百一十戶中，只有五戶有糧食，其餘的全都鍋蓋長在鍋子上了。他們說組織起來，社就是家，每天一早，他們就掖着個糧袋到辦公處向“家長”梁林借糧。可是，社剛剛搞起來，底子是空的，哪有糧借啊？梁林自己呢？也窮得跟他們一樣。可是他們又確實有困難。要是沒有入社，他們還可以挑個小蝦小魚賣，勉強度過這兩三個月，可是，現在能讓他們去獨自謀生不干地里的活么？那將來更不得了。梁林想到這裡，沒辦法，只好去跟政府商量，政府立刻答應借八千斤糧食給他們。梁林的心頭才象卸下了塊石板，西河南村的人也樂壞了。可是，水沿庄有一些人，聽見社里向政府借來了糧食，也連忙嚷着說沒糧，向梁林提出：

“給他們也得給我們！”

可是梁林知道他們家里多少还有点糧食，便斬釘截鐵地說：“一粒也不給！”這樣，水沿庄的一些人，對梁林更不滿了。他們說：梁林是水沿庄人，不說偏袒水沿庄吧，就是公平合理，也該把糧食分一半給水沿庄呀，可是人家一粒也不分！就這樣，有些人連梁林召集的會議也不來參加了。

可是，八千斤糧食，吃不多久就沒有了，地里的庄稼又似乎偏偏和人为難：長得特別慢。就連長得最好的五隊的庄稼，離收穫的時候也還遠。缺糧戶一清早又掖着個空糧袋圍到辦公處來：“梁主任，再借給我點糧，……”

糧食一粒也沒有了，拿啥借給他們呀！不吃糧，又哪來的

气力干活？庄稼长不好，秋后又咋办？……一连串问题，象一团团的乱麻，塞在梁林的脑子里。他想呀想的，总想不出个办法来，就一口气跑到留守营，把情况告诉了区委书记，最后的一句话是：

“没粮吃，社主任我搞不了，我不干了！”

“不干也得干，还必须保证把社办好。不要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！”

如果说梁林的话象铁一样硬，那末，区委书记的话就象钢一样——比铁更硬。硬跟硬碰在一块照理说应该冒出火来，可是梁林却突然低下了头——没到区来以前，面对着困难没法解决，他心里是烦乱的，可是现在意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竟要在困难的面前做逃兵，他心里就不只是烦乱而且是难过了。

“老梁，”区委书记用温和的声调说，“我知道你有困难，但任何事情都是有困难的，可我们能在困难面前退却么？”

接着，区委书记跟他仔细地分析了情况，然后指示：互助互济，多想办法，多跟群众商量。

梁林从区委会出来时，跟去时的心情完全两样了，好象区委书记借给了他十万百万斤粮食似的。他一想到党过去走过的困难的道路，一想到在朝鲜战场上那么艰苦的条件下，志愿军都战胜了敌人，就更充满了信心。在回社的路上，他忽然看见社里的一望无际的庄稼，长得那个蓬蓬勃勃的劲儿，奇怪自己来时竟一点也没有发现，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。

一回到社里，他就立刻找群众商量。最后决定：队与队互济；重新安排劳动力，在保证不耽误地里活的条件，搞一些临时性的副业——每队抽出一两个人来挑小鱼卖；一面又号

召大伙吃茄瓜青菜等代食品。因为依靠群众，發动了群众，把党的互助互济的政策耐心地向群众解釋清楚了，水沿庄的人不但不再伸手向社里要粮食，竟自动省出口粮，家家户户三斤五斤地把粮食借出来。一下就集中了六百多斤苞米。这样，才渡过了困难。

在刚刚建社的日子里，梁林不但要領導社員跟飢餓作斗争，还得領導社員跟自然作斗争。稻子剛在揚花吐穗的时候，洪水來了。梁林白天黑夜，領着群众防堤搶險。三号壩被水冲坏了，梁林親自跟群众一塊搶修：群众扛一百斤重的麻袋，梁林也同样扛一百斤重的麻袋。社員們一看見社主任都親自下手，勁头就更足，一天工夫三号壩就搶修好了。

就这样，社員們战胜了洪水，战胜了一切的灾害。于是，麥子成熟了，玉米成熟了，稻子也成熟了……。渤海二社建社后第一年獲得了丰收。

丰收給社員們帶來了喜悅，可是正当梁林滿怀着喜悅的心情領着大家分配丰收果实的时候，不料又產生了一个新的問題。

由于第一年办社，一切都沒有經驗，分配粮食时，随收随分，沒有掌握好，結果一算：西河南村的社員欠社里三千多元，社里却欠水沿庄的社員九千多元。这一來，水沿庄的社員又不滿了，他們說：

“这一年，我們白干了！”

于是，他們天天到社委会來逼着梁林要粮要錢。除夕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們全到社委会來了，圍着梁林乱嚷：

“你这社主任咋当的？把我們的粮食分給別人！”

“你啥事都偏心西河南村人，……这是我們的劳动果实呀！”

“今天社里不給我們錢，就拉騾子、赶羊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面对着这样的場面，梁林首先檢討了自己沒有經驗，分配粮食沒有掌握好，沒有完整的會計制度。接着又向大家解釋西河南村的社員多領了粮，也是情有可原的，因為他們要填补去年鬧灾荒虧空的粮食；要是領得太少，大年夜就沒有粮下鍋了。最后，他保証明年秋收后，欠社員們的粮食全部还清，并且根据銀行里的办法——照付利息。一句話：絕對不叫水沿庄的社員吃虧。可是水沿庄的社員还是不依。梁林的一个七十多歲的嬸子顫巍巍地冲着梁林說：

“你可把我胡弄坏了，不給錢我就退社！”

“对！不給錢我們就退社！”大伙全嚷开了。

正在大伙你一言我一語乱嚷着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亮着喉嚨提出了一个新問題：

“依我看，社里的賬目准有問題，說不定梁主任和社干部們都用了社里的錢！”

“我們要查賬！”另一个人大声喊。

“对！我們要查賬！”大伙全乱嘈嘈地嚷开了。

等到人声稍为平靜一些，梁林才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說：

“鄉親們，我欢迎大伙明天一早來查賬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水沿庄社員查賬的結果：梁林不但沒有用社里的錢，社里倒欠梁林一百多元，也欠所有社干部的錢。这一

來，大伙才感动得一句話不說，拿起帽子，低着头散开了。

由于不断地克服困难，渤海社巩固了下來。一九五五年秋天，比一九五四年獲得了更大的丰收。西河南村的一百多戶，除了少数几戶外，全都是余粮戶了。人們再也不叫他們“窮八分”了。因为社里欠水沿庄社員的粮已全部还清，水沿庄社員所分到的粮食就更多，光梁林孀子一家，就分到了一万多斤粮食。她家院子里前面是一个大白薯窖，后面是一大垛玉米。屋子里：地上是粮，炕上是粮，櫃里是粮，連那兩只大花瓶也裝滿了粮。而稻子还没有分！她告訴梁林說：

“我不要那么多粮食了，都沒处放了！你給我折成錢存在社里吧。”

梁林想起了去年的事情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咧着个大嘴对她說：

“还胡弄不胡弄你？你还出社不？”

那个老太太仿佛什么事情都沒有發生过，也咧着嘴說：

“你打死我也不出社了！”

由于大伙的生活都过得富裕了，水沿庄的人对西河南村的人再也沒有意見了，两个村子团結得象一家人一样。就在这种思想基礎和大丰收的物質基礎上，一九五五年冬天，渤海一社和渤海二社合并了；北沈铁路以南，渤海岸以北，沿着洋河的二十二个村子，全組織到渤海社來了。接着，这个拥有一万三千多个社員，四万五千多畝土地的大社，又轉成了高級社。一九五六年春天，梁林被选为这个大型的高級社的副主任。

春初，我到渤海社去的时候，梁林一边把他的故事講給我听，一边陪我繞了一大圈社里的土地，一直走到渤海边上。我說，社里打下了基礎，今后的困难也許可以少些了。他還沒等我說完，就搶着說：

“不，啥事情啥时候都有困难的，今后有今后的困难。”

我点点头，說：“是的，咱們的事業就象面前渤海灣的浪潮一样，总是不平靜地前進的，克服一个困难，就前進一步；困难不断地出現，可咱們的事業也在不断地前進！”

在我們面前的渤海灣的浪潮，正在奔騰呼嘯着，后浪推前浪，一浪一浪地向前奔去。……

“三 蘭”

在渤海社的三千多個社員里，一提起“三蘭”，誰都會豎起大拇指說：“三個都是好樣的，拿活當活干。”要不就說：“‘三蘭’嘛，登過報，唐山都知道！”

“三蘭”就是王淑蘭、王汝蘭、王惠蘭。

王淑蘭今年二十一歲，王汝蘭二十歲，王惠蘭才十七歲。三個人都是青年團員，三個人都是生產大隊的隊長，三個人同住在一條街，過去同上一個學校，現在又同在一個宣傳小組。每天晚飯後，三個人都在房頂接音廣播：一個拿着燈，一個念廣播詞，第三個就用廣播筒高聲廣播出去。直廣播到太陽落海，月亮上升。在地頭讀報，三個人一塊讀；到俱樂部閱覽室看書，三個人一塊去；沒有錢買書報，三個人就一塊到海邊摸螃蟹賣；三個人從小就在一塊唱歌一塊玩。除了干活吃飯非分開不可外，其他如做個鞋底、補個鞋疤都在一塊。不管在街頭上或在會場里，人們只要發現三個人中的一個，就准會頓時出現第二個，第三個。三個人就象一個人一樣。又因為三個人的名字末尾都是一個“蘭”字，社員們就管她們叫做“三蘭”。

“三蘭”真是黨的好宣傳員，不管啥運動，她們都搶在前頭。政府宣布糧食“統購統銷”，三個人就動員家里賣余糧，然後挨家挨戶宣傳黨的糧食政策。一九五四年春天建社的時候，

三个人就積極動員自己的家庭入社。秋天，社里跟洪水搏鬥，三个人在深夜里一聽見鐘聲響，就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冒着沒胸的大水直奔壩上，還鼓動了別的社員參加。今年社里又一次的大丰收後，社員的覺悟又提高了一步，黨團員便立刻醞釀轉高級社。十一月下旬，全社開動員大會，會一開完，社員們喜得合不攏嘴地走回家去，“三蘭”便象三條走水魚似的竄回家裏活動開來。王汝蘭家是個貧農，家裏只有媽和一個妹妹，全家靠她一個人勞動，今年她做了二百個勞動日，得了三百塊錢，因此在家說啥算啥，当了半个家，她一提出參加高級社，她媽二話沒說就答應了。王淑蘭的家裏是上中農，有三十多畝地，入社時，經過她再三動員才參加的，現在要土地歸社，怕爹媽一時想不通，回家後便立刻召集一家五口開家庭會議，不料全家都沒有意見，她倒反而感到奇怪起來，用懷疑的眼光盯着媽，她媽看透了閨女的意思，說：“隔年的皇曆用不得了，人是往高處走的啊。”王惠蘭的家是個貧農，爹媽一貫比較進步，在吃飯時她問爹轉高級社好不好，她爹瞪了她一眼：“轉高級社還不好？搞成蘇聯那樣的農莊更好，我等着坐農莊的汽車呢。”爹的話剛落音，媽便接過來：“丟下遠的說近的，咱娘倆個抓緊冬季的工夫，多給你兄弟姊妹做下几雙鞋，明年咱們一天工也不誤，爭取打更多的糧！”於是，這三個好宣傳員，便立刻向別的有顧慮的家庭走去。……

“三蘭”不但思想一致，感情相好，就連生活上的喜愛也十分相投。三个人都愛把自己的生活打扮得更美麗，就都在明亮的窗前種上一盆紅艷艷的綉球花。只有一樣，她們三个人